

中国企业史研究的多学科视域拓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学科对话:第二届中国企业史研究 WORKSHOP”综述

罗 婧 冉旭宏 于明珠 卢 婕

2019年11月2—3日,由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院联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学科对话:第二届中国企业史研究 WORKSHOP”在桂林成功举办。

当下,“中国制造”的崛起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大事件,中国正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理念,扩大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经济交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企业无疑既是受益者,又是主力军与先锋队;如同当年的美国、日本一样,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更逐渐成为学术性与现实意义并重的显学,国内外的学术界都在努力尝试揭示中国企业的秘密。正如诺斯所说:“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当下中国企业成功的秘密也深植于它的历史。同时,“企业”既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组织与共同体,并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因此,聚焦它的发展演化历程,并拓展其研究广度与深度,就必须引入经济史之外的多学科研究视角。

基于此,本次会议在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 WORKSHOP“范式与方法”的研讨基础上,邀请了日本经营史学会、欧美企业史学界的海外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上海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辽宁社科院、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院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关注企业史研究的学者,共70余人。会议围绕“跨学科”与“一带一路”两个关键词,展开对话与交流。

大会的主题发言分为两场,第一场侧重国际路径的借鉴,主要由外国企业史研究者介绍企业史研究的国际经验、研究现状以及展望企业史研究的未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泽井实(现任日本经营史学会会长、日本南山大学)以照相机及缝纫机产业的变迁为例,来说明战后日本的“轻机械”工业如何获得发展并成功成为出口工业的过程。特蕾莎(美国企业史学会前任会长、英国约克大学)就企业史研究如何跨学科对话和国际化发展提出了她的倡议。黑泽隆文(日本经营史学会富士会议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日本京都大学)回顾了世界各国企业史学科的研究特点和发展历程,并对中国企业史学科的发展提出建议。

第二场主题发言则开启了跨学科对话的第一回合,四位学者从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及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龙登高(清华大学)在二十余年对海外华商群体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新兴市场、南洋、北美及回国投资等文化环境下的企业家精神进行区域比较,考察辨析了市场、制度及文化三个因素对企业家精神释放的影响;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简介]罗婧,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桂林,541004,邮箱:gl_saralee@126.com。冉旭宏、于明珠、卢婕,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以对近代企业内部“职业团体”形成过程的考察为切入点,回应了前人认为近代中国企业组织以关系网络为组织逻辑的看法,从而更为动态地展示了传统基因与现代要素在近代中国企业内部的冲突与交融,为重新梳理近代中国企业内部组织逻辑的演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图景。封凯栋(北京大学)从工业产品的组织功能能力和知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铁路机车与汽车产业的比较,构造了“国家工业理解能力”的概念,试图以此来探索国家干预产业的绩效差异。蒋团标(广西师范大学)借助区域经济学的视角与GIS空间相关可视化分析工具,将视域拉回近十年间的“珠江—西江经济带”,考察其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人产地”协调发展的驱动力和可能的路径,试图揭示区域宏观经济背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大会小组讨论主要聚焦四个方向,共八个主题。

第一个方向是本次工作坊内容最丰富、互动最精彩的部分——“跨学科对话”,突出体现了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以及政治学等不同方法,是如何剖析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的。

其中,在以“国有企业的历史与现实”为主题的讨论中,宋磊(北京大学)从后发优势理论出发,尝试以生产组织方式为中心,来剖析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跨越所有制的竞合关系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本质特征,“多主体—多路径能力”构筑在这种竞合关系之下形成。贾文娟(上海大学)提出,应从生活世界、组织层面、国家历史、世界政治经济变迁四个维度出发,以一种独特的历史感和洞察力来对国企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进行剖析。朱妍(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国企大量采用分包式生产模式为研究对象,追究改革初期,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孕育出特别灵活的生产体制的深层原因。李君然(北京大学)则以中信重工和洛阳LYC轴承厂为例,对时间、地点相同的国有企业却出现巨大绩效差异的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探究。

以“车间里的政治”为主题的讨论关注企业内部的制度、群体意识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其中,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朱妍(上海社会科学院)全面梳理了苏联和中国关于计件工资制的实践差异,并提出形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制度设计:是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旨,还是优先解决生产关系问题。不利于建立合理有序的生产关系,导致计件工资制在中国几次被全面叫停。宣朝庆、司文晶(南开大学)以20世纪50年代末天津纺织工人工厂史写作为例,展现“诉苦”作为一种微观权力技术,如何呈现出福柯意义上的从权力技术逐渐转向自我技术的过程。杨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考察1925—1945年的民生公司内部科层组织建设、员工训练与管理、福利待遇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相互依赖的集团生活在制度规范下形成的过程。陈超(上海交通大学)基于对锦江油泵油嘴厂的田野调查,揭示了这个未被中国劳动政治领域关注的三线工厂工人主要来自内迁工人、返城知青和复退军人三个不同的族群。这三个来源作为不同的标签,塑造了工人之间的相互认知和对他人的态度。高度的隔离逐渐形成了三线工人趋向于一个“标签化的族群”模型的社会结构。王星(南开大学)提交的论文则探讨了在清末明初的工业化转型中,学徒制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被强制性杂糅嫁接在一起及其在转变过程中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影响。

以“政府、社会与企业行为”为主题的讨论,学科对话的跨度最大,从组织行为学的演化视角,到经济史对行业变迁的梳理,再到区域经济学的仿真建模。刘志阳、王陆峰(上海财经大学)从组织演化的视角出发,尝试把握中国社会企业的产生过程及社会企业组织的本质特征。赵晋(华东师范大学)通过回溯20世纪50年代上海火柴行业在生产方式、流通情况、市场规模、产品型制等领域的变化,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的发展变革态势。罗明(广西师范大学)从环境经济学多元共治的视角出发,引入企业声誉效应,通过复杂网络与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不同机制之下企业群体环境治理合作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把握企业群体环境治理合作行为的演化规律。李玉(南京大学)提交的论文则主要描述了晚清“官督商办”的公司机制及清政府对此机制的改进与探索。

第二个方向聚焦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比较视域。以“家族企业的传承与治理”为主题的讨

论着重对中法两国四个家族企业传承形式进行了历史梳理。杨在军(河北经贸大学)回溯了自贡井盐业整体企业制度演变中的长期因子及其在近代受到的外部冲击。周小兰(华南师范大学)介绍了19世纪法国家族企业的两种传承模式:排他性的家族男性成员合伙制、开放的二元股份合伙制。谢涛(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则从演化基因的角度分析了“六必居”家族企业的传承与延续,并尝试嵌入管理学的分析模型。

以“国外企业史与华侨企业家”为主题的讨论则分别关注日本、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海外华商。橘川武郎(日本东京理科大学)以石油产业为例,讲述了理解日本的石油产业史对于解决石油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有怎样的意义,并提出企业史应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情景的“应用经营史”的方法。林彦樱(日本广岛大学)则在分析了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小规模零售商长期存续的根植于日本特殊的市场结构和社会结构,认为零售业体系根据一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具有多样性。张海丰(广西师范大学)对英国早期的工业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并与美、德、法进行对比,探究了欧美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与值得中国工业化发展借鉴的经验。黄蕾(福建师范大学)以闽籍华侨银行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该群体的崛起及其在经营管理上的经验积累与社会责任担当。

本次会议聚焦的第三个方向是中国企业的成长与产业转型的经济背景透视,主要是经济史研究所关注的长期趋势与变迁研究。其中,以“企业发展的长期因素”为主题的讨论,侧重对变迁的空间关系、重要概念的追溯及长期效应的量化分析。徐毅(广西师范大学)在尝试构建1933年中国近代制造业厂数、厂址、产量和产值等多个指标的基础上,做了布局的可视化分析,揭示了近代制造业向省县级的扩散趋向。罗婧(广西师范大学)也运用GIS软件叠加地形和方言的因素,呈现了20世纪“珠江-西江”流域商会成立的时空变迁态势。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围绕15—19世纪“公司”在汉语相关文献的演变过程,论述了中国人对公司观念认识的不断深化。王鑫(西南财经大学)通过构建抗战时期后方十省的县级工业数据库,估计了全面抗战背景下的工业投资对当下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资本、企业治理的集中与分散”为主题的讨论关注的重点在于近现代企业的管理及融资问题。赵伟(苏州科技大学)考察了近代中国不同类型的多元化民族企业集团创建中枢管理机构的情况。于之伟(辽宁社会科学院)回溯了1948—1949年中共接管鞍钢并实现早期复产的整个过程。郭岩伟(西南财经大学)通过对近代在华外商企业股票溢价发行这一现象的梳理,为理解外资企业的资本运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四个方向主要延续并递进了2017年首届工作坊对“企业史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讨论,关注点聚焦于理论与历史的交融及企业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在对中外企业史研究进行比较与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企业史研究应在史学范式、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增加“企业管理学范式”的设想。柯华(立信会计学院)通过对荣家企业案例的分析,在诺思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尝试为近代企业史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严鹏(华中师范大学)对日本学者的通俗化读物《企业史入门》一书进行评介,认为中国企业史研究也要开始注重朝公共史学方面的发展。陈守明(同济大学)指出已有理论化历史对管理作用机理研究方面的不足,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方向与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不仅经济史关注企业,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都有不少学者研究历史上的企业,但由于学科壁垒,这些学科之间很少有交流和沟通。无疑,这造成了很大的资料浪费,也限制了企业史研究的理论高度。本次会议的相关论文与研讨则涵盖了经济史的变迁梳理、社会学的细部透视、经济学的理论检验及仿真模拟、管理学的案例叙述范式、政治学的公共治理视域等等,为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中国企业史的解析开展对话打下了一个良好开端。同时,对国际视野的重视是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特色。

(责任编辑:高超群)